

无论富裕与贫穷

国际贸易可能加剧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

尼娜·帕夫克尼克

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更多地融入了世界市场。由于贸易壁垒减少，加上通讯与交通更加便利，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可以在海外建立并管理生产基地，雇用发展中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由于导致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制造业就业萎缩，上述这一变化经常遭到指责，并演变为当前对国际贸易的反对浪潮。

然而，过去30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上升，尤其是在亚洲。例如，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巴西、中国、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经济体80%到96%的受访者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其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在这些国家中，仅有1%到13%的受访者认为国际贸易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这一调查结果与戈尔德贝格和帕夫克尼克 (Goldberg 和 Pavcnik, 2007) 在其学术文献中提到的证据相吻合。该文献发现，国际贸易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国际贸易对国内不平等的影响是复杂的，因为国际贸易影响居民工资与消费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且其影响随着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变化。贸易一体化的程度；劳动力和资本跨越企业、行业、国境流动的难易程度；以及受影响者在其国内收入分布中所处的位置等都是影响因素。因此，本文根据对几个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不平等效应的近期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工资不平等

如果国家能够实现专业化生产，而且国际贸易使得工人从进口竞争行业向出口导向行业转移，那么通常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这导致进口竞争行业工人的工资下降，但同时提高了出口导向行业工人的工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国际贸易的工资不平等效应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国际贸易可能提高行业中不同企业的同等水平员工的工资差距。企业的绩效各不相同，经营良好的企业更可能从事出口业务。近期对阿根廷和墨西哥的两项研究发现，成功的企业能从新的出口机会中受益，其员工也

因而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 (Verhoogen, 2008 ; Brambilla, Lederman 和 Porto, 2012)。

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处理不断恶化的收入与机会不平等的良好条件。

此外，在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公司中，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员工来说，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员工还能获得额外的收益。原因何在？因为高收入国家的消费者通常比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更高。而优质产品的生产与营销需要素质更高、工作更努力的员工，因此同一企业的高、低技能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被拉大。

更重要的是，几项研究发现，国际贸易还会影响整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不平等。

越南就是很好的例证。2001年，越南与美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对越南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降低了23个百分点。但各行业关税下降的幅度并不相同。由于越南各省有自己擅长的行业，其中某些省份的就业集中在受益于关税降低的行业，而另外一些则很少有人从事这些行业。因此，出口成本降低对各省工人的影响则不尽相同。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某些行业由于出口成本的降幅更大，使其所在省份受益更多，从而使这些省份的贫困水平下降的幅度也更大 (McCaig, 2011)。贫困水平的降低是由于产品出口至美国市场使得对当地工人的需求迅速增长，从而提高了其工资水平，特别是那些只受过初等教育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这些省份本来就比较富裕，因此，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

对越南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扩大了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另外几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由于各地区生产的产品不同，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易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

由于工人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加上地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不完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可能会长期存在，



越南胡志明市的服装工人。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国际贸易对工人的影响差异的大小取决于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印度的例子

我们再来看看印度的经历。1991年刚开始施行贸易自由化时，印度的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 $\frac{1}{3}$ 。通过改革，减少了对国际贸易的大量限制，平均进口关税从1991年的87%下降到1996年的37%。佩蒂亚·托帕洛娃(Petia Topalova, 2010)研究了印度某些地区受进口关税下降的影响，这些地区因进口关税的降低而增加了其海外竞争压力。

研究发现，在这段时间，印度全国总体贫困水平下降。但是，研究也发现，印度某些农村地区受进口竞争的冲击较大，其贫困水平降幅也因而较小。由于进口关税降低导致当地劳动力需求减少，工业和农业工资水平因而降低，对贫困家庭的伤害特别严重，因此导致相对贫困加剧。其中，处于收入分布百分位底部第10位和第20位的家庭，其人均消费水平下降幅度最大。

一般来说，由于劳动力可以从受进口竞争冲击的地区流动到更高工资的地区，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间的工资差距可能会消失。但是，印度不是这样。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因某些地区受到贸易改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实际上，贸易改革之后十年间，印度只有不到0.5%的农

村居民和4%的城市居民由于经济原因流动到其他地区。其中，文盲和贫困家庭的地域流动比率尤其低。

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员流动呢？

因为人员流动成本很高，而且也不可能借到钱搬家。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家庭和种姓等级制度和机制是非正式的社会保险，这更进一步阻碍了人员的流动。有时人员不流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别处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此外，由于受进口竞争影响，这些劳动力的技能和经验并不符合其他地区扩张行业的需要。

结果表明，进口竞争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降低了进口税，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此后20年巴西劳动力调整情况(Dix-Carneiro和Kovak, 2015)。与印度相同，巴西的改革也导致某些地区进口竞争压力加大，降低了其劳动力工资水平。但是，与印度不同的是，巴西各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因此有所降低，因为受进口竞争影响的地区本来就比较富裕。

令人惊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贸易对地区工资的负面影响反而会越来越大，原因何在呢？

在资产贬值之后，为应对进口竞争的压力，企业主缩小经营规模，甚至关闭当地工厂，造成劳动力需求慢慢减少，因此当地工资水平越来越低。而服务需求也随之减少，更是让当地劳动力市场雪上加霜。与印度类似，劳动力也没有迁移出受进口竞争冲击的地区，其中很多人最终在非正

式行业寻找工作。

上述例子表明，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是引发国际贸易不平等效应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此开展进一步研究，更深入地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关键障碍，包括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流动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阻止了受进口竞争冲击的劳动力在扩张行业再就业。

消费：穷人和富人

由于能够买到更多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因融入全球市场而受益。而且，他们也因此能够买到外国企业生产的商品，包括药品和手机。其中，有些好处体现在消费之外。例如，肯尼亚的农户不仅使用手机与朋友联系，还能使用手机银行，获悉国际市场上经济作物的价格等信息。

同时，国际贸易带来的消费收益也是不平等的，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差距相当大。穷人通常在食品、衣服等贸易品上的花费比在住房、教育等非贸易品上的花费更多。最近一项研究考察了包括12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国际贸易一体化给穷人带来的消费收益更大，因为贸易品的国际价格平均降幅比非贸易品更大，而富人消费了更多的非贸易品（Fajgelbaum 和 Khandelwal, 2016）。

但是，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

国际贸易对消费的影响可能取决于贸易自由化的类型和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购物模式。例如，墨西哥和阿根廷等中等收入和转型经济体最近开放其零售行业，允许国外零售连锁店进入本国市场，而此类政策在印度就遭到了强烈反对。墨西哥的经验表明，尽管穷人能从外资零售连锁店受益，但其受益程度比富人小。

一项即将发表的研究发现，墨西哥各收入阶层消费者都能因外资零售连锁店的进入而受益，因为这些连锁店商品价格更低、商品品种更多、购物设施（如选址与停车场）更好（Atkin、Faber 和 Gonzalez-Navarro）。但是，在墨西哥收入分布中，顶部20%家庭的消费收益比底部20%家庭的消费收益更大，因为富裕家庭更有可能在外资连锁店购物。

另外，虽然国际贸易降低了边境地区商品价格，但并不表示偏远地区市场价格也能随之降低。因为国内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以及发展中国家国内批发和零售行业竞争强度很小，所以国际贸易带来的消费收益在国内的分配并不平等。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偏远地区的消费者并不能因进口商品而受益，因为其国内的交通成本和垄断中间商瓜分了潜在的消费者收益（Atkin 和 Donaldson, 2015）。

总之，尽管消费者能够因国际贸易而受益，但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消费收益分配并不平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

穷人在贸易品上花费了大部分收入，因此上述不平等不容忽视。

确保机会均等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民意调查，巴西、中国、印度、越南等国民众致力于实现更自由化的国际贸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国际贸易的各种不平等效应和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无论这是否是由国际贸易引起的。当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出现的反对国际贸易的浪潮就具有警示性。同时，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处理不断恶化的收入与机会不平等的良好条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较低，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民众获得公共产品的机会并不平等。其中，有限的受教育机会尤其令人担忧。而在今天全球经济时代，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供不应求，并且这些人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冲击也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因此，政策争论应该聚焦于充分发挥国内体制的作用，确保机会均等，特别是要提高教育水平和促进地域流动，以让目前落后的群体能够分享到更多的国际贸易收益。■

尼娜·帕夫克尼克（Nina Pavcnik）是达特茅斯学院尼豪斯家族国际关系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

参考文献：

- Atkin, David, and Dave Donaldson, 2015, "Who's Getting Globalized? The Size and Implications of Intranational Trade Costs," NBER Working Paper 2143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Atkin, David, Ben Faber, and Marco Gonzalez-Navarro, forthcoming, "Retail Globalization and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Brambilla, Irene, Daniel Lederman, and Guido Porto, 2012, "Exports, Export Destinations, and Skil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2, No. 7, pp. 3406-38.
- Dix-Carneiro, Rafael, and Brian Kovak, 2015,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gional Dynamics," unpublished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 Fajgelbaum, Pablo, and Amit Khandelwal, 2016, "Measuring the Unequal Gains from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1, No. 3, pp. 1113-80.
- Goldberg, Pinelopi, and Nina Pavcnik, 2007,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5, No. 1, pp. 39-82.
- McCaig, Brian, 2011, "Exporting out of Poverty: Provincial Poverty in Vietnam and U.S. Market Acc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85, No. 1, pp. 102-13.
- Topalova, Petia, 2010, "Factor Immobility and Regional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on Poverty from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 2, No. 4, pp. 1-41.
- Verhoogen, Eric, 2008, "Trade, Quality Upgrading, and Wage Inequality in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Sect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3, No. 2, pp. 489-530.